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4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4 2012
(第11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11)

阶层分化与意识形态安全的辩证关系

王 翼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6)

摘 要: 社会阶级、阶层现象是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依据财富、声望以及权力的不同而产生的一种客观现象,它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分析的理论范式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这种主观认知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张力引致人们在社会制度发展上的一些失误。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产生就是对这一点最好的确证。从意识形态与社会阶层的发展现实看,只有当意识形态符合社会阶层发展的实际,特别是要体现出阶层分化的趋势,两者之间才能达到一种良性的互动状态。

关键词: 阶层分化; 意识形态安全; 辩证关系

中图分类号: DO-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202(2012)04-0129-07

一、阶层分化是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

"两阶级一阶层"是我国传统的社会阶层结构。近30年,这种社会结构一直处于调整分化的过程中,不断产生新的社会阶层,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也不再孤立存在,而与各阶层的具体利益相结合。阶层分化,是社会转型的必然现象,是社会改革的必然结果。

首先,经济制度的变革是阶层分化的源动力。上层建筑中的一切变化几乎都可以追溯至经济领域的变动,经济制度的变革无疑是我国社会阶层分化的最主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原本比较单一的公有制逐渐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坚持国有经济、集体经济把持国家经济命脉的同时,大力发展私营企业、个体工商业等私营经济。对私营经济作用的定位也发生了由"补充"至"必要有益的补充"再到"重要组成部分"的变化。在政治与法律上承认私营经济的社会地位和存在合法性对当代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相对于个体户、承包户的发展,私营企业规模的不断壮大不仅改变了人们占有的经济资源状况,更使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层次的改变。私营企业在社会财富积累方面起到的滚雪球效应,使其财富增长的速率远超一般的社会成员。阶层间分化的趋势也逐步显现。

其次,经济体制变革是阶层分化的内驱力。1992年,在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我国经济体制在不断探索中由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入市场经济轨道,实现了资源配置方式的重大变革。围绕市场这一新的经济资源配置方式,各种新行业、新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市场的不断细化,社会分工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细。这些都为阶层变化提供了条件,成为阶层分化的内驱力。社会分工的丰富通过职业结构的变化体现的十分明显,例如各种职业掌握的社会资源以及薪资水平都存在差异,并且这种差异有日益扩大的趋势。一些高新职业,像电力、烟草等具有垄断性质的行业以及一些私营企业,受到了人们热烈追捧。而一些事业单位,党政机关,例如公务员,虽然工资水平并不高,但由于这些职业在掌控各种社会资

收稿日期: 2012-09-10

基金项目: 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CXLX11_0164)

作者简介: 王 翼(1983—),男,安徽蚌埠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思潮.

源方面比其他职业有独特的优势,也成为人们就职时的首选。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在职业中的地位差异(包括各种社会资源的掌控以及薪资水平的不同)与人们的阶层地位差别是具有极其密切的联系,"横向分工中越精细,相对来说,职业的差异性就越大,而职业的差异必然带来收入的差异和社会地位的差异。在就业的垂直分工中,职级越高、在分工中所处的管理层级越高、职业的知识要求越高,在分工中掌握的资源就越多,其社会阶层地位自然就越高。"[1]12另外,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传统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也实现了由计划到市场的历史转变。劳动力市场的完善以及相关制度的出台增加了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可能性。"劳动力资源在流动的过程中也遵循一般要素诸如资本、技术、土地、房地产的流动规律,即在价格信号的引导下,从价格较低的地方流向价格高的地方,也就是说劳动力资源由效益差的地方流向效益好的地方,实现劳动力要素的优化配置。"[2]同时,"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在劳动力的流动过程中也起着作用,素质较高的劳动力会有较高的机率获得较好的工作岗位,相反,则有可能成为下岗失业人员,从而实现了市场对社会成员的分化。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当市场取代计划成为劳动力的配置机制后,极大地加快了社会阶层分化的速度。

最后,产业结构的变革是阶层分化的助推力。"按照现代社会转型的规律,只要社会的产业化达到一定的水平,社会流动率也必将显著提高,这样将加速身份制的崩溃,即引起阶层结构的变动。"[3]而随着我国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的不断调整,我国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构成当中,第一产业产值所占比重明显下降,第二、第三产业比值显著上升,即大批人口从第一产业转移至第二、第三产业。这种转移的主要源头是第一产业的农民以及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中的工人。"农民中有一部分人成为私营企业主、个体户,相当一部分人成为制造业和建筑业的生力军。由于城市经济结构、企业结构的变化,大批原来国有工业企业的职工转入新兴的第三产业,一些人成为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也有些人成为失业人员、半失业人员。这种转移与流动使原来最大的两大社会群体——农民与工人产生了明显的分化,成为不同社会阶层的成员。"[1]13

二、阶层分化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巨大影响

任何时候,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阈下只能是意识到的存在,而这种存在就是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意识形态观念,不论是关于他们同自然界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或关于他们自己肉体组织的观念,都是他们的现实活动和现实关系的有意识的表现,不管这种表现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这些观念总是指向现实的,总是有自己特定的社会内容的。"[4]

从某种意义上说,意识形态包含于社会结构当中,是社会结构的观念的构成,换言之,意识形态就是观念的上层建筑。毫无疑问的是,不仅社会中的个人有思想,有观念,社会本身也是具有一定的价值信念与思想观念的,否则人与社会都将落入自然之物的范畴。因此,在社会结构的各组成要素中,意识形态是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事实上,很多学者都认为社会结构的变迁必将引起思想观念或价值信念的变迁。著名学者曼海姆将意识形态分为特定意识形态观与整体意识形态观,他认为,在整体意识形态观的发展中,虽然哲学本身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在深层次起作用的还是社会运动,"在那里,社会的结构及其与之相呼应的知识形式是随着社会各阶级的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5]44而齐泽克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意识形态不是虚假意识,不是对现实的虚幻再现,而是社会存在本身。"[5]115由此不难理解,当社会结构的组成要素发生变化时,意识形态也会随之变化,反之亦然。转型中的当代中国,阶层分化是重要的国情之一,由社会阶层结构的巨大变化所形成的社会影响,特别是产生的对意识形态安全强大辐射力,已不再是理论上的应然,而是现实中的必然,由此形成的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巨大牵引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层面,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将影响社会政治发展和建设的原则以及社会成员价值取向,进而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产生影响。从结构性意义上考察,在一定社会结构中掌握主要社会资源的阶层,很大程度上便是这个社会发展方向的掌舵者,正如陆学艺教授所言,“各社会阶层及地位等级群体的高低等级排列,是依据于其三种资源(组织、经济、文化资源)的拥有量和拥有的资源的重要程度来决定的。在这三种资源中,组织资源是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资源,因为党和政府组织控制着整个社会中最重要的和最大量的资源。”[6]作为主导阶层,社会政治建设由这一阶层发起,而政治建设的核心目标也往往是从维护自身的利益角度出发,作为达成目标的依赖路径——在全社会树立起能共吸引人民群众的某种政治价值体系,只有在社会政治发展过程中能够朝有利于保证获得合法性的方向发展,并被全社会最大多数人认同接受时,才能成为主流政治原则或价值取向为整个社会所共同遵循,才能起到社会动员,维护统治的作用。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是“二阶级一阶层”的简单社会结构,各种社会资源由国家配置,实行高度集中的社会发展模式,从而形成一种总体性社会。在这样的关系中,国家往往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和独立目标,在设计国家政治规划时更多的要体现国家自身的利益而不仅仅是某一个阶级阶层的需求。作为一个后发现代性国家,要快速打牢社会主义发展所需要的经济基础,就离不开通过意识形态来实现对全社会的动员。从这个角度说,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目标与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具有内在一致性。在当时阶层分化程度还很低的情况下,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又为自上而下动员群众提供了便利的机制,因此在当时,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很容易被人们接受,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形成一种“大一统”的整合局面,再加之进行广泛的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抑制其他意识形态出现,以及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等精神,当时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在单一社会阶层结构的背景下,再配之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发展与建设原则,从而得到了最大多数人的信任,成为一种全社会的价值取向。而伴随阶层分化的加剧,由计划走向市场,意识形态领域“大一统”的简单局面也日趋复杂,新时期如何在政治建设、政治发展中有效体现出这种新变化,将直接关系到对主流意识形态在复杂局面中的有效控制。

第二,经济层面,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将影响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能否理顺新的利益关系将直接关系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如上文所言,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政府安排支配一切,行政机构的权力对整个社会生活具有绝对的支配权,人们对组织、对权力往往是绝对服从。同时,人们的社会结构,如政治、经济特别是人们的意识结构都围绕这样一种行政关系展开,从而造成人们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僵化。虽然这样会丧失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但社会利益结构平衡,特别是人民群众的心态也相对稳定。阶层分化作为新时期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最显著特征,无疑是社会进步的体现;而在阶层分化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因为社会结构的变化引致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从而导致社会利益结构的重组,社会成员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无一例外的开始重新认识自己,重新给自己的社会地位定位,以使自己能够在新的社会结构中处于有利地位。在这样一种趋势下,利益关系的改变必然影响到一部分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在既得利益有得有失的状态下,人们对政府政治权力的实施效度评价也不一样,在思想观念领域也必然会对人们的心态造成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以社会公正为例,“社会成员是在自身的前后变化和与他人相比的差别变化中形成了社会公正感,这就说明社会成员的社会公正感不仅是依据动态的社会事实形成的,而且还是在各种比较关系或社会联系中产生的。”[7]美国社会学家弗兰克. R 斯卡皮蒂曾指出,社会混乱的产出经常发生在当一种社会制度的某一方面未能让每一个社会成员充分实现自身价值及其按自身价值所设立的社会目标时。当阶层分化打破传统利益格局而新的利益格局尚在形成之中时,社会各阶层都希望社会变革能够朝自身有利的方面发展,能够实现自身的价值及其社会目标,但传统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必然会带来各阶层的经济落差,由此一些利益相对受损阶层产生了心态失衡

的现象，例如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攀比心理、无望心理以及仇官、仇富等，都暴露了阶层分化过程中的不安定因素。这些由于社会结构变迁、阶层分化而产生的浮躁心理，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力是难以想象的。在阶层分化的现实中，如何培育各阶层成员对利益再分配结果的理性态度和良好心态对新时期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第三，文化层面，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会引起社会政治文化的转型，将直接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产生影响。对于政治文化，阿尔蒙德指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有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得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8]29 由此不难理解，处在一定社会体系中的社会成员的思想与行为都难免会受到政治文化的影响，它与政治组织等制度性结构相对应，是一国国民对自身承担的政治角色的认知前提，更是形成相对稳定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观念的基础。而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信念体系，具有某种行为取向，是一种可以激发和指导社会成员政治行为的综合性思想观念。可见，作为政治社会的精神范畴，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具有相当密切的联系。传统的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呈现出明显的臣民特征，这与当时中国社会特定的政治环境相适应，它将社会身份以先赋的方式给予每一个社会成员，以此规定了他们的生活行为方式。在这样一种政治文化系统中，人们大多扮演一种井然有序却十分被动的角色，无法有效感知自身可能对社会政治系统产生的影响，与部分政治精英群体之间表现出一种简单的管控与被管控关系。而伴随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人们社会身份的体现也由原来的政治因素转变为经济因素，臣民型政治文化也自然而然地逐渐被一种崭新的公民型政治文化所替代。"在我国，公民社会之所以能兴起并作为一个可期的目标来构建，其最深刻的根源就是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9] 这种公民型政治文化塑造了一种具有明显世俗特征的文化环境，社会成员对于外在权威不再盲目服从，以往消极被动的政治角色逐渐变的积极主动，对于社会政治现象的分析也更具有主体意识。随着政治文化由政治权威向公民权利过渡，结构分化也不可避免的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集中表现为国家意识形态与一般社会意识形态从高度统一的状态逐步走向相对分离的状态。"[10] 换言之，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虽然在社会体系中仍然处于核心地位，对社会发展起主导作用，但它对整个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即一般社会意识形态的整合不再像以往具有绝对的强制性；由此不难推断，如果各阶层群众出现较为强烈的对立性的思想观念，引导不好势必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不可估量的冲击。

三、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对阶层和谐的价值引领

伴随政治经济体制变革，社会阶层分化的趋势愈来愈明显，这使和谐社会的建设道路充满了各种不稳定因素，特别是意识形态安全已成为当前社会最受人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意识形态，就其本身来说具有明显的实践性与工具性，而实现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目的。所以，"直接参与社会生活，以巩固或改变一定的社会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和理论指导的意识形态。充分发挥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诸方面的巨大功能，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的基本保证。"[11] 综上，保障意识形态的安全，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功能，对维护阶层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意识形态安全为实现阶层和谐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柱。实现阶层和谐是为当代中国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的必然要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以阶层和谐为基础。毫无疑问，实现各阶层的和谐与构建和谐社会一样，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建设的一个

复杂艰巨而又立体的工程。历史的经验表明,但凡大国崛起,崛起的必定是这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一个国家若离开共同理想,缺少共同的价值信仰,必定因缺失凝聚力而容易陷入一盘散沙,社会发展、谐稳定更是无从谈起。例如,我国最大朝鲜族聚居地——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以来,60 年的时间完成了由贫困闭塞到开放前沿的转变,如今地区生产总值已增长 60 多倍。腾飞的背后,除了国家政策的有力引导,更在于这 60 年培育的共同理想价值信念深入人心,“延边州在全州范围内开展“延边精神”大讨论活动,号召广大群众能够提出自己心中的“延边精神”……60 年的发展使延边各族群众铸造出共同的精神,包括爱国、奉献,也有包容、担当……共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理念形成共同的价值追求,凝聚延边各族人民的思想和意志,从根本上形成发展合力。”[12] 窥一斑而知全豹,“延边精神”的巨大作用告诉我们,阶层的和谐,社会的发展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作基础,更离不开坚实的精神支撑作保证。从意识形态自身来说,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任何意识形态都是对一定社会阶级或集体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的反映,它通过对群体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阐述,使社会成员从中意识到个人与阶层,个人与群体间的一体关系,从而在社会各阶层间形成一种有力的凝聚力,产生一种强大的激励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持意识形态领域的稳定和安全,才能发挥意识形态的特殊力量,为阶层和谐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持。无疑,意识形态安全是意识形态功能正常发挥的前提,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为构建和谐阶层提供精神支持,主要在于它的激励功能与凝聚功能。首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帮助无产阶级实现自身的根本利益作为其追求的最终目标,并用科学的理论阐述了广大人民群众追求自身利益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从而将个人与社会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维系在一起。其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把广大人民群众在心中企盼却又没有清楚认识的思想意识,经过整合后以理论体系、原则方法等方式转变成具体的奋斗目标,用勾勒出的美好愿景唤醒广大人民群众为共同理想而努力的热情。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目标,正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各阶层的共同愿望。正是这个远大而又艰巨的目标正在激励着社会各阶层中的每一个成员以空前团结的姿态投身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中。总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各阶层人民群众提供了一条实现自身利益与社会理想的可行路径,同时又明确了人们的社会责任与社会地位,是社会各阶层团结和谐的重要精神支撑。

其次,意识形态安全为实现阶层和谐确立正确的价值导向。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立国安邦之纲,任何一个稳定的社会,必定要有一个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价值系统,社会成员必然有着趋同的价值观与价值追求,这要求社会成员在平日的政治行为中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和理论依据,这就需要一个缜密的理论体系为其作理论支撑与服务。失去正确的价值引导,社会成员在平日的为人处事中就会缺少共同遵循的价值规范,便有可能陷入以自己为尺度的“种族假象”的误区,即人们在认识事物时,不是以“宇宙的尺度”,而是以自己为尺度,这样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整个社会失去了有序和谐的保障,陷入混乱与动荡。在阶层分化的背景下,能否在各阶层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回顾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意识形态一定程度上提供这样的理论体系,即作为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是对社会现实关系的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观念体系,包括了政治、道德、艺术、哲学、宗教等社会思想,是社会统治阶层获取统治合法权和稳定政治秩序的理论依据,更是他们获取进行社会统治所需价值取向的思想理论来源。正像马克思指出那样,“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13] 因此,在保证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基础上,主流意识形态在一定的范围内作出一定程度的

让步与妥协,目的就是通过尽可能地满足各阶层成员的需求来换取他们的认同与支持,这样统治阶级"就能变政治领导权的硬性控制为文化领导权的软性控制,使被统治阶级'自愿服从'现存的统治秩序。统治阶级的文化领导权确立后,主流意识形态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能为社会提供价值导向,使全体社会成员自觉遵循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规范。……同时,还能从理论上论证这些目标的现实可行性,指明实现目标的现实途径,为民众提供价值导向和行动指南,使全体社会成员具有统一的意志、统一的目标和统一的行动"[14]。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主导价值体系,可以为社会各阶层成员的社会活动确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阶层和谐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总体说来,意识形态对各阶层的价值导向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意识形态为阶层和谐的建构提出价值目标。这种价值目标一般都包含在统治阶级的政治目标中,既能保证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又需要对各阶层的合法利益作出反映,这是获得各阶层群众认同的前提。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旨在实现全人类的自由解放,不仅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更体现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是阶层和谐的价值目标;其次,意识形态为和谐阶层的建构提出价值准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出的正是这样一种,以全阶层人民群众利益为出发点,以全阶层人民群众认同为落脚点的价值准则。例如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再如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公平正义"标准等,都为新时期构建阶层和谐提供了重要的价值标准;再次,意识形态还可以为和谐阶层的构建提供价值规范。与法律法规的强制性不同,意识形态体现的价值规范具有柔性,重在对人们的教化与范导,以希人们的行为与意识形态提倡的价值观相对应。

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其本质就是关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意识形态,所以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设想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逻辑必然,作为理论性极强的一种意识形态,它在整个社会中所倡导的价值观念对于各阶层和谐相处意义非凡;当然,意识形态对社会价值导向的确立必须建立在社会成员广泛认同的基础之上,倘若意识形态自身面临崩溃,价值导向的确立只能是无稽之谈。

再次,意识形态安全为实现阶层和谐提供有力的整合工具。意大利著名学者葛兰西将意识形态称为"水泥",可见整合作用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功能之一,指的是对社会关系、思想观念以及各种社会文化的统摄、聚合作用,也就是说"人们可以从中体会到个人与国家、个体与共同体间休戚与共的意识形态,唤起人们强烈的聚合心理,并将这种聚合心理上升为共同信念和奋斗方向,并转化为统一行动,以达到民族国家有效的内部统一和社会控制"[15]。同时,任何意识形态都能起到一定的整合作用,但是产生机制有所不同。一般的社会意识形态,整合作用的产生机制是一种自发的过程;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则不同,由于在整个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以及在社会意识形态中所处的特殊位置,它的整合作用更多的是一种自觉过程。总体来说,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源于社会发展的实际诉求。如今,社会随着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各种社会问题也趋于明显。"由于我国三场社会变革几乎同时进行:由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场改革就像一场深刻的革命,广泛影响了人们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人们的心里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巨大的落差使一些人产生了心里失衡。"[16]这些因素的存在对于各阶层的和谐无疑会起到负面效应,增大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形下,如何正常发挥意识形态整合功能,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便是构建各阶层和谐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大整合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社会思想的整合。意识形态经常以共同的社会理想、奋斗目标、价值规范等来引导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理性追求自身利益,并协调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利益矛盾,让各种利益关系形成良性互动。如科学发展观、包容性发展等概念的提出;其次,倡导相互包容的理念。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倡

导要兼顾各阶层利益,“在贫富之间存在巨大鸿沟的社会里,正规的利益表达渠道很可能是由富人掌握的,而穷人要么保持沉默,要么是时而采取暴力或激进的手段使人们听到他们的呼声。”[8]230 所以,纵观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历程,对利益相对受损阶层的关注一直是倍受关注的方面;再者,加强各阶层对社会利益的认同。随着由市场经济主导的文化渗透进社会生活中,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已不再像以往那样难以遮遮掩掩而是得到了社会的认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全社会共同利益为结点将各阶层乃至个人利益连接成一个有机网,号召人们在实现个人利益的基础上为实现全民族共同利益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1] 彭心安. 阶层分化与社会和谐[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
[2] 李　拓. 和谐与冲突:新时期中国阶级阶层结构问题研究[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99.
[3] 杨国斌. 社会阶层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21 - 122.
[4] 俞吾金. 意识形态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31.
[5] 季广茂. 意识形态[M]. 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44.
[6] 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8.
[7] 刘少杰.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迁[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138.
[8] 阿尔蒙德,鲍威尔. 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 曹沛林,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9.
[9] 王乃圣. 转型期我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困境与对策探析[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9,(6).
[10] 张治库. 公民社会的国家意识形态与道德教育[J]. 当代教育论坛,2005,(8).
[11] 黄传新. 构建和谐社会与意识形态建设[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11.
[12] 李凤双,秦　春,宗　巍. 共同价值理念让金达莱越开越艳[N]. 新华社每日电讯,2012 - 9 - 3(1).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0.
[14] 刘明君,郑来春,陈少岚. 多元文化冲突与主流意识形态建构[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60.
[15] 张继国,江新国. 和谐社会: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重构[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365.
[16] 敖带芽.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热问题与冷思考[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53.

On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 ot Social Stratum Differentiation and Ideology Ssecurity

WANG Yi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210016, *China*)

Abstract: The social class and the social stratum phenomenon are objective phenomena based on wealth, prestige as well as the authority in the social development process; pareadigm.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certain subjectivity as a social structure analysis theory This intermediate betuseen the subjective cognition and the objective reality brings about errors in social system development. As the important constituent ot superstructure, the ideology security problem is the best proof to this point. Viewine it from the reality, only when the ideology conforms to the social class development reality, especially it manifests the tendency of social stratum differentiation, a kind of benign interaction condition can be achieved.

Key Words: social stratum differentiation; ideology security; dialectical relations